

社區發展對社區居民生活品質影響 之研究－臺灣的實證研究分析

莊俐昕・黃源協

壹、前言

自 1965 年「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將社區發展列為其七大項目之一，臺灣社區發展的推動迄今已逾半世紀，約在 1965 年之後的 30 年，歷經 1968 年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1983 年修改為「社區發展工作綱領」）、1968 年的「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1972 年改為十年計畫）、1981 年的「臺灣省社區發展後續第一期五年計畫」、1986 年的「臺灣省社區發展後續第二期五年計畫」、1991 年再更名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以及 1992 年的「臺灣省現階段社區發展工作實施方案」之施行，在強調以基礎工程、生產福利及精神倫理等三項建設為主軸的前提下，已為社區發展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礎。

1990 年代中期，因傳統的社區發展工作已到達一個瓶頸，在 1995 年的「全國社區發展會議」為社區工作開啓另一個發展的契機。隨著 1996 年 5 月的「加強推展社區工作實施方案」之公布，同年底提出的

「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要點」讓「社會福利體系」與「社區發展工作」密切結合。約此同時，一股以文化建設為主的「社區（總體）營造」亦在政府高層的推動下開展出，讓臺灣的社區工作出現雙元的發展。2002 年民進黨政府推出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之「鄉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以及 2005 年推出的「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讓臺灣的社區發展的更加多元且繽紛，其所推出的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保生態、環境景觀等六大面向，無非是欲藉由全面改造與提升社區，以打造一個安居樂業且高品質的健康社區。

社區發展有其過程目標，也有其結果目標。就過程而言，社區發展欲藉由「培力」（empowerment）來提升其社區能力（community capacity），以為社區奠定穩固的發展基礎；就結果而言，社區發展在於獲致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生活環境，以提升其居民的生活品質。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我們不禁好奇地想問：臺灣社區發展

狀況如何？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如何？社區發展對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有何影響？本研究期能藉由實證研究解答前述的問題，並據以提出未來臺灣社區發展的相關建議，期能有助於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的提升。

貳、文獻檢閱

一、社區的意涵與範疇

社區 (community) 一詞是社會科學常用的概念之一，但它卻缺乏明確的定義。社區可能是由近鄰或行政轄區所組成，或者是具有共同文化或相同特質、利益或問題的一群人所組成 (Hardina, 2013)，這群人往往具有社會面與心理面的聯繫 (Green & Haines, 2008; Mattessich & Monsey, 1997)。傳統上，臺灣對於社區的定義係以地理疆界之「地緣社區」為主，晚近亦漸漸擴展至以諸如關注特定公共議題的「事緣社區」，例如，數個社區共同採取跨界的合作模式，一起推動空間 (物質) 或文化 (人文) 方面的建設。儘管社區的定義愈來愈有彈性，但因其模糊不清的特性可能影響研究的可靠度與統計考驗力 (Coulton, 2005)，使得如何界定社區的範疇，往往成為社區研究者遭遇到的首要挑戰。為此，許多採取個案式的社區研究還是以地理區域所範定的社區為主 (例如，Obst, Smith & Zinkiewicz, 2002; 梁炳琨、張長義, 2005; 黃源協、莊例昕、劉素珍, 2015)。基於研究可行性的現實考量，本研究還是回歸以地理區域的劃分基準做為研究抽樣的依

據。

二、社區發展的意涵與面向

何謂社區發展 (community development)？Sinder (1969: 21) 認為社區發展即是成長與變遷，係指運用技術達成可測量的 (短期) 目標，以及創造無形的哲學、社會和人群之改變的 (長期) 目標；Mattessich 與 Monsey (1997: 57) 認為，社區發展主要係透過一種資源分享的過程，以將人聚集在一起，並達成改變生活品質的共同目的。英國內政部認為，社區發展係指與社區協力之集體行動的過程，其目的在於藉由確立需求，並採取符合需求的行動，以達成社會正義和符合特定目標的變遷 (Home Office, 2004: 8-11)。前述的定義某種程度的彰顯出，「社區發展」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目的，視為一種過程，它是要透過理性的規劃、行動和評估，並採取集體的行動，以挑戰壓迫和不平等；做為一種目的，它是要促進社會的變遷和社會正義，以提昇社區的生活品質。

顯然，社區發展關注的不僅是其結果，亦夠重視過程中的培力。Taylor, Barr 與 West (2000) 所提之社區發展路標 (signpost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即提出兩大面向作為全面性社區發展之參酌：社區培力與社區生活品質。社區培力 (過程) 包括四項目標：(1) 一個學習型的社區：個人培力；(2) 一個公平和正義的社區：正向行動；(3) 一個活躍和有組織的社區：社區的發展；以及 (4) 一個有影響力的社區：參與和投入。社區生活品質包括六

項目標：(1)一個共富的社區：地方經濟發展；(2)一個關懷的社區：社會發展和服務；(3)一個綠色的社區：環境發展；(4)一個安全的社區；(5)一個適宜的居住地；以及(6)一個永續的社區。社區生活品質的六項目標與「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六個面向頗為吻合——「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保生態」與「環境景觀」。本研究以前述的論述，建構出社區發展的六個面向，包括：(1)社區文化；(2)社區經濟；(3)健康福祉；(4)環境景觀；(5)公共設施；及(6)社區安全（請參閱研究設計與方法）。

三、生活品質的意涵與面向

如何提昇人們的生活品質一向是人類所共同關注的議題，也是個人、社區及國家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然而，對於如何界定與測量生活品質，卻仍是莫衷一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將生活品質定義為「在文化與價值系統的社會脈絡中，個人對其所處生活狀況的感覺（WHO, 1999）。Seik（2000）將生活品質界定為「個人對整體生活的滿意度」；Bonaiuto, Fornara 與 Bonnes（2003）認為生活品質是「居住在某個特定地區所衍生的愉悅或滿足的經驗」；Costanza 等人（2007）則指出，生活品質常被用於代表人們的需求如何被滿足，以及個人或團體在生活各領域感受到滿意或不滿意的程度。Aki（2008）認為，生活品質一般被認為包括生活滿意度、社會功能、日常生活活動、以及身體的健康。

國內也有不少研究者提出生活品質的定義，李永展、吳孟芳（2005）認為，生活品質係指人民對其所處生活環境的滿意度。陳宜音（2002）認為，生活品質是一個人對於其生活狀況所做的整體評估，生活品質評估又可分為客觀指標與主觀指標兩種。林素穗（2004）認為生活品質是一個複合的概念，包括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心理的及文化的各種層面，生活品質可用來測量地方優勢、吸引外在投資和全球活動，並塑造地方特殊意象和魅力，帶動城市行銷、吸引資本投入。

研究者對生活品質的討論往往難以跳脫出客觀（objective）與主觀（subjective）的範疇。「客觀」面向是一種運用量化的社會、經濟和健康等指標，以反映人們需求滿足的程度，其使用的指標如識字率、工作、住宅、所得、健康、醫療人事、綠地、犯罪率以及一些無須經由個人主觀評量的指標（Schneider, 1975; Ackerman & Paolucci, 1983; Costanza et al., 2007: 268）。以「客觀」指標衡量生活品質的假設即是：如果客觀條件變好，人們的心理感覺會因而轉佳，亦即。客觀生活條件與主觀生活滿意度兩者之間存有一致且正向的關聯性（Masserman & Chua, 1980; Walter-Busch, 1983; Marans, 2003），但並非所有的研究皆全然支持這樣的論述，例如，Schneider（1975）的研究即發現，客觀指標所測出之最富有的城市，並不必然是那些主觀上對其生活情境最感滿意的城市；反之，客觀上最差的城市，也並不必然是那些主觀生活滿意度最差的城市。因此，客觀的社

會指標不能夠被直接採用作為個人實際經驗的福利或生活品質。

當客觀的指標被質疑為無法反映出人們生活的真正態度，有學者即主張：品質必須是主觀的，衡量「生活品質」最正確的做法，即是直接詢問民眾個人的生活主觀感受（Schneider, 1975；孫明為，1997）。Kahneman 等人（1999）在一份整體生活品質評估的文獻中即指出，生活經驗的品質是建立在個人主體及評估者的文化和社會

脈絡之上（引自 Marans, 2003：73），Marans（2003: 75）亦指出，情境的客觀條件本身並不能夠表達情境的真實品質，而是這種情境對其居住者的意涵。顯見，「主觀」與「客觀」的衡量各有其立論基礎，也各有其限制。本研究主要採取主觀生活品質的論述，並據以建構出生活品質的兩個次面向：「個人生活面」與「社區生活面」。（請參閱研究設計與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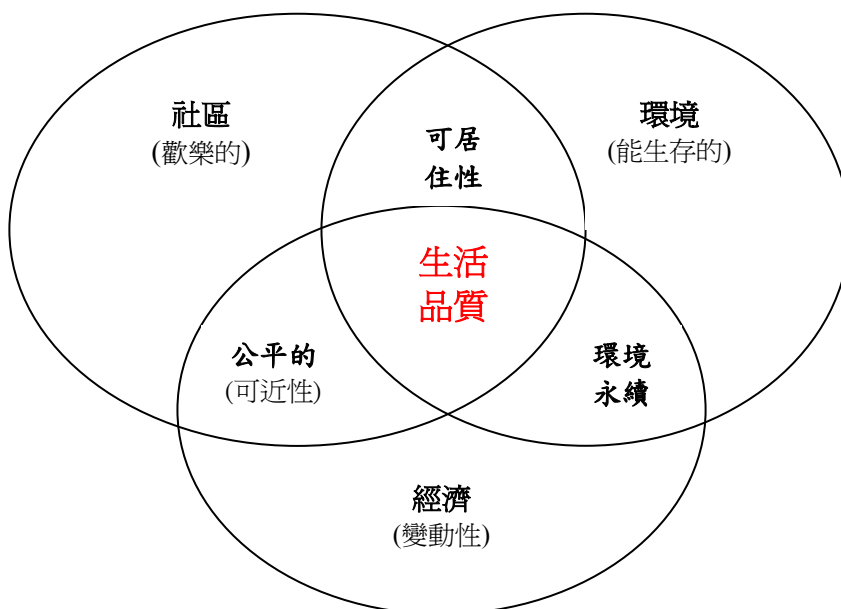


圖 1 生態觀點之有益社區社會品質的要素之概念模式

資料來源：Shafer, Lee & Turner, 2000: 166。

四、社區發展與生活品質

一個人的生活品質與其所處之社區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Shafer, Lee 與 Turner

（2000）即從人文生態學（human ecology）的觀點認為，一個永續的社區要能為其所有居民提供並維繫一種優質的生活（a good quality of life），該模式認為社區生活

品質是由社區（社會）、經濟與（物理）環境等三領域的品質之持續性的互動所創造出。該模式認為，可居住性、永續性、公平性及生活品質是社區、經濟與環境三者之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可居住性是環境與社區領域之交互作用的結果，永續性是環境與經濟領域交互作用的結果，公平性則是社區與經濟交互作用的結果，三項領域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即是生活品質（如圖 1）。

Raphael 等人（2001: 190）的研究亦指出，社區生活品質是由許多交互關聯的因素所組成，這些因素反映出一個社區的獨特歷史，包括政治、經濟因素、地方服務性和慈善性組織、以及地方居民個人的特質。熊瑞梅（1995）針對臺中市都市邊緣的個案社區之研究亦證實，社區居民對維繫生活品質的公共設施較滿意，且較常參加更新建設主導之社區活動，有助於鄰里彼此支持性的往來，以致社區意識增強，此與社區生活品質維護形成良性循環；因此，密切的鄰里關係、適切的社區行動以及社區意識增強，此與社區生活品質維護形成良性循環（孫明為，1997）。Marans（2003）在底特律地區研究的模式指出，環境與都市的舒適度關係到社區品質和個人活動、滿意度及身體健康；其中，環境舒適度包括自然的休閒資源，如湖泊、河川、濕地、森林及開放空間，而周遭環境品質則包括空氣、水、噪音、固態危險廢棄物；都市舒適度係指人造的休閒資源（如游泳池、自行車道、高爾夫球場等）。

社區發展是一種有計畫的工作，其目

的在於欲建立資產以增進居民改善其生活品質的能力（Green & Haines, 2008）。Muljono（2011）在印尼的實證研究即發現，社區發展的參與模式對社會之物質和非物質皆帶來正向的改變。Collier 與 Mitchell（2015: 48）亦認為，若能在偏遠社區發展財物和基礎結構的能力，不僅有助於開創工作機會，亦有助於改善生活品質。就此而言，社區發展與社區居民之生活品質可能存在著某種關係，若我們能予以瞭解並據以提出有益於社區發展之建言，對社區居民生活品質之改善或提昇，將有其重要且實質的意涵。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工具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社區發展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的概況與關聯性，並試圖建構社區發展影響生活品質的關係模式（研究架構如圖 2），分析資料係擷取自研究者所主持/參與之科技部專案計畫—成長或發展？社區能力與社區生活品質之研究。本研究將社區發展區分為六個次面向（各 4 題），包括：

1.社區文化

(1)社區內有藝文活動（如表演、展覽）；(2)社區有文化資源（如多元文化、古蹟、傳統風俗或文物）；(3)社區有在地的節慶活動（如建醮、蜂炮等）；(4)社區致力於推廣傳統文化（如書法、讀經、地方風俗等）。

2.社區經濟

(1)社區居民的收入是穩定的；(2)社區居民的收入能支應日常生活開銷；(3)社區擁有在地產業或商圈；(4)社區居民可以就近找到工作。

3.健康福祉

(1)社區居民容易取得醫療保健服務；(2)社區居民的身心是健康的；(3)社區有針對弱勢家庭提供相關服務；(4)社區有向政府申請經費來提供福利服務（如老人送餐、兒童課輔等）。

4.環境景觀

(1)社區環境品質良好（如空氣、水質、土質）；(2)社區擁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如濕地、天然景觀）；(3)社區的景觀很好；(4)本社區公共空間維護得很乾淨。

5.公共設施

(1)本社區有足夠的停車空間；(2)社區公共設施是完善的（活動中心、公園、社教館）；(3)本社區聯外道路是便利的；(4)本社區有便利的大眾交通工具。

6.社區安全

(1)社區有災難應變系統（如消防、緊急救援等）；(2)本社區有足夠的照明設備；(3)本社區有足夠的監視器；(4)社區警衛、警察或地方守望相助隊能維護社區減少犯罪。

「生活品質」係指受訪者對其自身所經歷或感受之社區各面向的評價，依其內容之性質，本研究將生活品質區分成二個次面向（各6題），包括：

1.社區生活面

(1)我喜歡我居住的社區；(2)我對於現在的居住環境感到滿意；(3)我對居住的社

區有歸屬感；(4)我有機會參與社區的活動或社團；(5)我與鄰居相處愉快；(6)我對我的居住品質感到滿意。

2.個人生活面

(1)我與家人的關係良好；(2)我擁有穩定且良好的人際關係；(3)我有許多無話不談的好朋友；(4)個人擁有適當的工作；(5)我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感到滿意；(6)我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感到滿意。

「社區發展」的總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870，整體總解釋變異量為 54.959%，各分量表的信度 Cronbach's α 值皆在.50 以上，總解釋變異量在 45.400%~72.080%之間。「生活品質」的總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908，整體總解釋變異量為 72.278%，分量表的信度 Cronbach's α 值皆在.83 以上，總解釋變異量在 55.767%~65.352%之間。另外，為瞭解社區地理區位對社區發展與生活品質的影響，本研究亦依其屬性將社區區分為四種類型，包括：(1)鄉村型社區；(2)山地型社區；(3)都市型社區；(4)市鄉混合型社區。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正式施測階段仍以臺灣本島立案之 6,220 個社區發展協會為研究母群體，依 PPS 原理進行獨立抽樣，共計抽出 600 個研究樣本，再針對社區發展協會之理事長或總幹事採面對面方式進行訪談，實際完成之有效問卷為 301 份。因正式施測之間卷僅刪除用於預試的少數題項，故在排除刪除題項後，亦將預試完成的 339

份問卷納入分析（預試樣本取得與正式施測階段同），最後實際用於分析的問卷共計 640 份。本研究採取的統計分析方法包

括：描述性統計、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分析以及多元迴歸分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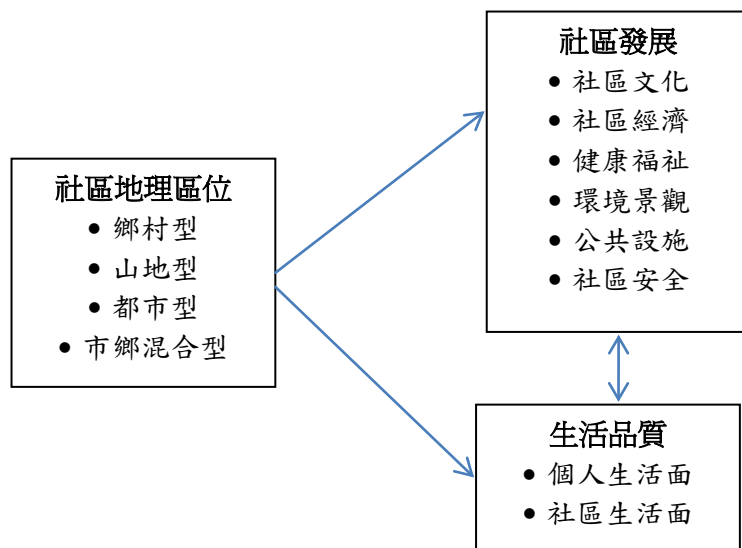


圖 2 研究架構圖

肆、研究結果

一、社區地理區位、社區發展與生活品質之概況分析

就社區地理區位而言，以鄉村型社區最多（49.4%），其次為都市型社區（27.9%），再其次為市鄉混合型社區（20.7%），最少者為山地型社區（2.0%）（見表 1）。

表 1 社區地理區位次數分配表

變 項	樣本數（%）
鄉村型社區	315（49.4%）
山地型社區	13（2.0%）
都市型社區	178（27.9%）
市鄉混合型社區	132（20.7%）
總計	638（100.0%）

就「社區發展」的同意程度觀之，整體「社區發展」之平均數為 3.40，在六個次面向中，以「環境景觀」之平均數 3.63 最高者，其次依序為「公共設施」之 3.54、「健康福祉」之 3.43、「社區安全」之 3.39、「社區文化」之 3.29，最低則為「社區經

濟」之 3.11（見表 2）。另外，就「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的同意程度觀之，整體「生活品質」之平均數為 4.05；進一步觀察其次面向，以「社區生活面」的平均數 4.10 較高，「個人生活面」之平均數為 4.01（見表 3）。

表 2 社區發展各面向平均數及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面向	平均數/標準差
社區發展 Mean=3.40 SD=0.47	社區文化	Mean=3.29 SD=0.75
	社區經濟	Mean=3.11 SD=0.72
	健康福祉	Mean=3.43 SD=0.63
	環境景觀	Mean=3.63 SD=0.66
	公共設施	Mean=3.54 SD=0.61
	社區安全	Mean=3.39 SD=0.63

表 3 社區居民生活品質各面向平均數及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整體生活品質 Mean=4.05 SD=0.45	社區生活面 Mean=4.10 SD=0.49
	個人生活面 Mean=4.01 SD=0.49

二、社區地理區位、社區發展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之變異數分析

就社區地理區位與社區發展之變異而言，社區發展的「社區經濟」（ $F=5.878$ ， $p<.001$ ）、「健康福祉」（ $F=5.293$ ， $p<.01$ ）、「環境景觀」（ $F=8.655$ ， $p<.01$ ）及「社區安全」（ $F=2.744$ ， $p<.01$ ）的差異達顯著水準；經事後比較分析，鄉村型社區在

「社區經濟」與「健康福祉」的表現上顯著低於都市型社區，但在「環境景觀」則顯著高於都市型社區。山地型社區在「社區經濟」的表現上，顯著低於都市型及市鄉混合型社區，而在「社區安全」的事後比較並未達顯著（見表 4）。另外，就社區地理區位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之變異而言，社區居民生活品質並不因社區地理區位之不同而有顯著變異（見表 5）。

表 4 社區地理區位與社區發展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地理區位	社區發展						整體社區發展
		社區文化	社區經濟	健康福祉	環境景觀	公共設施	社區安全	
社區地理區位	鄉村型社區	13.33	12.12	13.42	14.96	14.24	13.43	81.51
	山地型社區	12.44	9.78	11.89	15.89	13.89	11.67	75.56
	都市型社區	13.13	12.94	14.12	13.77	14.05	13.81	81.85
	市鄉混合型社區	12.95	12.57	14.04	14.48	14.13	13.71	82.05
	總計	13.17	12.42	13.74	14.53	14.16	13.57	81.64
變異位	F值	.716	5.878** G1<G3 G2<G3,4	5.293** G1<G3	8.655*** G1>G3	.257	2.744* PH 無顯著	.970

表 5 社區地理區位與生活品質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地理區位	生活品質		整體生活品質
		社區生活面	個人生活面	
社區地理區位	鄉村型社區	24.55	23.99	48.51
	山地型社區	22.925	22.62	45.54
	都市型社區	24.77	24.31	49.07
	市鄉混合型社區	24.56	24.06	48.64
	總計	24.58	24.05	48.63
變異位	F值	1.641	1.584	1.855
	F值	1.630	1.740	1.924

三、社區發展與生活品質各面向之相關分析

就社區發展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的關聯性而言，社區發展的各項因素與生活品質的總體及其各項因素皆達顯著正相關。其中以「整體社區發展」與「整體生活品質」($r=.542$, $p<.001$)的相關度最高。就各次面向觀之，社區發展的「環境景觀」

與生活品質的「社區生活面」($r=.506$, $p<.001$)，以及社區發展的「公共設施」與生活品質的「社區生活面」($r=.435$, $p<.001$)的相關程度較高；社區發展的「社區經濟」與生活品質的「社區生活面」($r=.232$, $p<.001$)、「個人生活面」($r=.240$, $p<.001$)的相關程度相對較低。總體而言，社區發展與生活品質之間的各項因素是互有關聯的（見表 6）。

表 6 社區發展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各面向之相關分析表

社區發展	面向	整體社區發展	生活品質		
			社區生活面	個人生活面	整體面
社區文化		.738***	.381***	.326***	.384***
社區經濟		.662***	.232***	.240***	.260***
健康福祉		.731***	.380***	.322***	.384***
環境景觀		.645***	.506***	.332***	.459***
公共設施		.720***	.435***	.359***	.433***
社區安全		.704***	.305***	.310***	.335***
總分		1	.539***	.452***	.542***

四、社區發展對生活品質之影響

(一) 社區發展各因素對整體生活品質之多元迴歸分析

以社區發展的六個面向與整體生活品質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 $F=47.140$ ， $p<.001$ ），其 $R^2=.573$ ，調整後的 R^2 為 .329，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 32.9%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

顯示，有四個面向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環境景觀」（ $t=6.898$ ， $p<.001$ ）、「健康福祉」（ $t=4.356$ ， $p<.001$ ）、「公共設施」（ $t=3.024$ ， $p<.01$ ）及「社區文化」（ $t=2.342$ ， $p<.05$ ）；亦即，「環境景觀」、「健康福祉」、「公共設施」及「社區文化」表現愈佳者，其整體生活品質愈佳。其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見表 7）：

$$Y(\text{整體生活品質}) = .575X_1(\text{環境景觀}) + .411X_2(\text{健康福祉}) + .295X_3(\text{公共設施}) + .175X_4(\text{社區文化}) + 26.173$$

表 7 社區發展各因素與整體生活品質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整體生活品質	<i>B</i>	<i>S_e</i>	Beta	<i>T</i>	<i>p</i>
常數	26.173	1.390		18.828	.000
社區文化	.175	.075	.099	2.342	.020
社區經濟	.027	.076	.015	.361	.718
健康福祉	.411	.094	.191	4.356	.000
環境景觀	.575	.083	.285	6.898	.000
公共設施	.295	.097	.134	3.024	.003
社區安全	.121	.091	.056	1.329	.184
整體模型	R ² =.573 adj R ² =.329 F=47.140 <i>p</i> =.000				
Y（整體生活品質）=.575X ₁ （環境景觀）+.411X ₂ （健康福祉）+.295X ₃ （公共設施） +.175X ₄ （社區文化）+26.173					

註：* $p<.05$ ** $p<.01$ *** $p<.001$

(二) 社區發展各因素對生活品質之「社區生活面」多元迴歸分析

以社區發展的六個面向與生活品質之「社區生活面」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 $F=54.034$ ， $p<.001$ ），其 $R^2=.597$ ，調整後的 R^2 為 .357，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 35.7%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顯示，有 4 項因素具有顯

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環境景觀」（ $t=8.806$ ， $p<.001$ ）、「健康福祉」（ $t=4.860$ ， $p<.001$ ）、「公共設施」（ $t=2.962$ ， $p<.01$ ）及「社區文化」（ $t=2.267$ ， $p<.05$ ）；亦即，「環境景觀」、「健康福祉」、「公共設施」及「社區文化」表現愈佳者，「社區生活面」愈佳。其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表 8）：

$$Y(\text{社區生活面}) = .390X_1(\text{環境景觀}) + .243X_2(\text{健康福祉}) + .153X_3(\text{公共設施}) + .090X_4(\text{社區文化}) + 12.197$$

表 8 社區發展各因素與生活品質之「社區生活面」多元迴歸分析表

社區生活面	<i>B</i>	<i>S_e</i>	Beta	<i>T</i>	<i>p</i>
常數	12.197	.738		16.525	.000
社區文化	.090	.040	.093	2.267	.024
社區經濟	-.018	.040	-.018	-.457	.648
健康福祉	.243	.050	.207	4.860	.000
環境景觀	.390	.044	.354	8.806	.000
公共設施	.153	.052	.128	2.962	.003
社區安全	.019	.048	.016	.400	.689
整體模型	R2=.597 adj R2=.357 F=54.034 p=.000				
Y(社區生活面)=.390X ₁ (環境景觀)+.243X ₂ (健康福祉)+.153X ₃ (公共設施)+.090X ₄ (社區文化)+12.197					
註：* p<.05 ** p<.01 ***p<.001					

(三) 社區發展各因素對社區居民生活品質之「個人生活面」多元迴歸分析

以社區發展的六個面向與生活品質之「個人生活面」進行多元迴歸之統計檢驗發現，此模型的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 $F=25.923$ ， $p<.001$ ），其 $R^2=.460$ ，調整後的 R^2 為 .212，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

釋依變項 21.2% 的變異。進一步檢視各變項之個別解釋力顯示，有五個面向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重要性依序為「環境景觀」（ $t=3.603$ ， $p<.001$ ）、「健康福祉」（ $t=2.932$ ， $p<.01$ ）、「公共設施」（ $t=2.470$ ， $p<.05$ ）、「社區文化」（ $t=2.087$ ， $p<.05$ ）及「社區安全」（ $t=1.994$ ， $p<.05$ ）；亦即，「環境景觀」、「健康福祉」、「公共設施」、「社區文化」及「社

$$\begin{aligned} \text{區安全} \text{表現愈佳者，其「個人生活面」} & \quad +.163X_2 \text{ (健康福祉)} +.142X_3 \text{ (公共設施)} \\ \text{愈佳。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見表 9）：} & \quad +.092X_4 \text{ (社區文化)} +.092X_5 \text{ (社區安全)} \\ Y \text{ (個人生活面)} = & .178X_1 \text{ (環境景觀)} +14.053 \end{aligned}$$

表 9 社區發展各因素與生活品質之「個人生活面」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個人生活	<i>B</i>	<i>S_e</i>	Beta	<i>T</i>	<i>P</i>
常數	14.053	.821		17.109	.000
社區文化	.092	.044	.095	2.087	.037
社區經濟	.041	.045	.040	.907	.365
健康福祉	.163	.056	.139	2.932	.004
環境景觀	.178	.049	.161	3.603	.000
公共設施	.142	.058	.118	2.470	.014
社區安全	.107	.053	.091	1.994	.047
整體模型	R2=.460 adj R2=.212 F=25.923 p=.000				
Y (個人生活)=.178X ₁ (環境景觀)+.163X ₂ (健康福祉)+.142X ₃ (公共設施)+.092X ₄ (社區文化)+.092X ₅ (社區安全)+14.053					

註：* p<.05 ** p<.01 ***p<.001

伍、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 社區居民對整體社區發展持正向偏低的看法，其中以「景觀環境」和「公共設施」的肯定度較高，「社區經濟」與「社區文化」則相對較低。鄉村型社區在「景觀環境」顯著高於都市型社區，但在「社區經濟」與「健康福祉」則顯著低於都市型社區。

整體而言，社區居民對整體社區發展持低度正向的看法，且不因地理區位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然而，在社區發展的次面向上，卻出現鄉村型社區的「景觀環境」顯著高於都市型，但在「社區經濟」與「健

康福祉」則顯著低於都市型；另外，山地型社區在「社區經濟」上亦顯著低於都市型及市鄉混合型。顯然，都市型社區擁有「社區經濟」及「健康福祉」上的優勢，鄉村型社區則擁有「景觀環境」的優勢。Taylor 等人(2000)所稱的「一個綠色社區—環境發展」較易出現在鄉村社區，「一個共富的社區—社區經濟發展」與「一個關懷的社區—社會發展和服務」較易出現在都市型社區。Wasserman 與 Chua (1980) 即提醒，因各地的客觀條件並不一致，社區研究必須要考量地方特性的差異。同樣地，一個社區若欲朝向全面性社區發展，須先瞭解自身優弱勢，且在社區的走向應選擇保有優勢、改變弱勢的發展策略。

(二)社區居民對整體的生活品質持正向的看法，對「社區生活面」的生活品質略高於「個人生活面」。山地型社區無論是「社區生活面」或「個人生活面」的品質皆相對較低。唯前述的差異皆未達顯著水準。

整體而言，社區居民對整體的生活品質持正向的看法，都會型社區在「社區生活面」和「個人生活面」的品質皆相對較高，山地型社區皆相對較低，但其差異並未達顯著差異程度。生活品質是一個人對其生活狀況所做的整體評估（陳宜音，2002）、是一種「個人對整體生活的滿意度」（Seik, 2003）、也是一種「居住在某個特定地區所衍生的愉悅或滿足經驗」。前述各類型社區對生活品質的反應無顯著差異，可能與社區各自的特色與優弱勢所產生的一種截長補短的綜合現象有關。

(三)整體或各面向的社區發展與整體生活品質，皆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景觀環境」、「健康福祉」、「公共設施」及「社區文化」等四個次面向，依序皆可有效解釋並預測整體生活品質。

整體而言，整體或各面向的社區發展皆與整體生活品質有顯著的相關，其中，有四個次面向可有效解釋並預測整體生活品質，其重要性依序為「環境景觀」、「健康福祉」、「公共設施」與「社區文化」。值得關注的是「社區經濟」對整體生活品質的解釋力最低且未達顯著。這種現象或許可印證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Amartya Sen（1999）所指出之經濟上的「成長」不必

然帶來整體生活品質之提昇的「發展」。Green 與 Haines（2008）亦指出，經濟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導致「發展」，例如，一個社區財富增加了，但若這種財富是由少數家庭所持有，這種改變將被視為是一種「成長」而非「發展」。因而，在社區的脈絡裡，成長可能只是發展的機會（opportunity），它不必然帶來足以讓人們覺得生活品質已獲得改善的「發展」。

(四)整體或各面向的社區發展與生活品質之「社區生活面」與「個人生活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景觀環境」、「健康福祉」、「公共設施」及「社區文化」等四個次面向，依序皆可有效解釋並預測「社區生活面」與「個人生活面」；另外，「社區安全」亦可有效解釋並預測「個人生活面」。

整體而言，整體或各面向的社區發展皆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之「社會生活面」與「個人生活面」有顯著的正相關，其中，如同整體生活品質般，「環境景觀」、「健康福祉」、「公共設施」與「社區文化」等四個面向，皆可有效解釋並預測「社會生活面」與「個人生活面」。這些現象與許多研究的發現是一致的，例如，Shafer 等人（2000）指出，生活品質是社區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生態交互作用的結果；Raphael 等人（2001）亦指出，社區生活品質是由許多交互關聯的因素所組成，包括政治、經濟、物理環境、公共運輸、地方組織等。值得關注的是「社區安全」亦可顯著解釋並預測「個人生活面」，這種現象可能與晚

近天然災變及治安事件對個人人身安全造成的威脅有關。

二、結論與建議

(一) 社區的優勢是一種資產，可作為邁向全面性社區發展的媒介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整體或個別面向的社區發展，皆與整體、社區及個人面向的生活品質有顯著的正相關；本研究亦發現，社區居民對「景觀環境」和「公共設施」的肯定度較高，鄉村型社區的優勢是「景觀環境」，都市型則是「社區經濟」與「健康福祉」較具優勢。晚近社區發展的策略已從傳統的「問題路徑」(problem path) 轉向「資產路徑」(asset path) (Kretzmann & McKnight, 1993; Green & Haines, 2008)，社區發展經營者應在充分瞭解社區的優弱勢情境下，設定社區發展的整體目標，從社區的既有的優勢介入，啟動社區居民對社區的信心與行動，讓社區的優勢能產生漣漪效應，逐步補充或改善社區不足的面向，進而朝向全面性社區發展的目標邁進。

(二) 經濟福祉不必然帶來生活品質的提昇，社區發展宜避免過度偏重社區產業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整體、社區或個人的生活品質，皆受許多社區發展面向的影響，其重要性皆依序為「景觀環境」、「健康福祉」、「公共設施」及「社區文化」。值得注意的是，「社區經濟」與社區生活品質各面向之相關度雖有顯著，但卻是最低

的，且它對生活品質的影響並不顯著。這些結果或許意味著社區經濟對生活品質的影響相對是較低或有限的。審視臺灣晚近的社區發展，「社區產業」的思維似乎凌駕其他面向，無論是社區發展或社區營造，皆相當強調產業發展，甚至以產業發展作為社區發展的主軸。我們不否認社區產業對社區的重要性，但卻必須提醒，社區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要能夠提昇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社區生活品質則是受到社區發展各面向的影響，社區產業之帶來經濟福祉的「成長」，並不必然是提昇生活品質的「發展」，為此，社區發展經營者宜避免僅過度偏重產業，而疏忽甚至犧牲其他面向的發展，尤其是影響生活品質最深的「景觀環境」與「健康福祉」。

(三) 社區發展策略非一體適用，須依社區地理環境特性做調整或選擇

本研究發現，社區發展確實與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息息相關，唯因地理區位的不同，社區發展各面向對生活品質的影響程度不一。本研究亦發現，「環境景觀」與「健康福祉」係影響居民生活品質最重要的兩個面向，然而，都市型社區在「環境景觀」處於相對劣勢，鄉村型則是「健康福祉」處於相對劣勢。「資產路徑」的觀點並非是要讓我們忘卻「問題路徑」，而是另一種介入的選擇。為此，當我們欲從社區的優勢介入時，亦須依社區所面對的迫切性問題，對發展策略做必要的調整或選擇。亦即，社區經營者除須掌握社區的優勢外，對於社區相對不足之處，須視其重

要性與迫切性，選擇合宜的推動策略。例如，因鄉村型的發展策略宜以「健康福祉」之營造為先，都市型則宜以「景觀環境」之營造為重，以縮小或避免因社區內部各面向的發展失衡，而影響居民的生活品質。

（本文作者：莊俐昕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黃源協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特聘教授）

關鍵詞：社區發展、社區生活品質、社區地理區位、社區資產

參考文獻

- 李永展、吳孟芳（2005）。〈臺北市主觀生活品質之衡量〉。《都市與計畫》，32(4)，387-420。
- 林素穗（2004）。《城市生活品質評量之研究》，立德管理學院地區發展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孫明為（1997）。《以公共設施滿意度與社會網絡強度評估社區生活品質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
- 梁炳琨、張長義（2005）。〈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的文化經濟與社會資本：以山美社區為例〉。《地理學報》，39，31-51。
- 陳宜音（2002）。《臺灣人民生活品質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黃源協、莊俐昕、劉素珍（2015）。〈社區能力與社區生活品質之研究：對社區治理與社區發展的意涵〉。《公共行政學報》，49，1-35。
- 熊瑞梅（1995）。〈社會網絡的資料蒐集、測量與分析〉，收錄於章英華、傅仰止、瞿海源（編），《社會調查與分析：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與前瞻之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Ackerman, N. & Paolucci, B. (1983).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ncome adequacy: Their relationship to perceived life quality measur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1), 25-48.
- Aki, H. et al. (2008).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levels of life skills, and their clinical determinants in out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Psychiatry Research*, 158, 19-25.
- Bonaiuto, M., Fornara, F. & Bonnes, M. (2003). Indexes of perceiv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in urban environments: a confirmation study on the city of Rom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65, 41-52.
- Collier, O. & Mitchell, P. (2015). Building capacity to improve economic health. *NC Med J*, 76(1): 46-49.

- Costanza, R. et al. (2007). Quality of life: An approach integrating opportunities, human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logical Economics*, 61, 267-276.
- Coulton, C. (2005). The place of communit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research: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Social Work Research*, 29(2), 73-86.
- Green, G. P. & Haines, A. (2008). *Asset build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 Hardina, D. (2013). *Interpersonal social work skills for community practice*. New York :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Home Office (2004). *Firm Foundations: The Government's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London: Civil Renewal Unit, Home Office.
- Marans, R.W. (2003).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rough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the 2001 DAS and its us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65, 73-83.
- Mattessich, P. & Monsey, B. (1997). *Community building: What makes It Work: A review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uccessful community building*. Minnesota: Amherst H. Wilder Foundation.
- Muljono, P. (2011). The model pf family empowerment program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West Java, Indonesi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3(11):193-201.
- Obst, P., Smith, S. G. & Zinkiewicz, L. (2002). An exploration of sense of community, part 3: Dimensions and predictors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in geographical communitie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0(1), 119-133.
- Raphael, D. et al. (2001). Making the links between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community quality of life in Riverdale, Toronto, Canada. *Health & Place*, 7, 179-196.
- Schneider, M. (197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large American Cities: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4), 495-509.
- Seik, F. T. (2000).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urban quality of life in Singapore (1997-1998). *Habitat International*, 24, 163-178.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Shafer, C. S., Lee, B. K. & Turner, S. (2000). A tale of three greenway trails: user perceptions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49, 163-178.
- Sinder, L. (1969). *Concept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Hinda Press.

- Taylor, M., Barr, A. & West, A. (2000). *Signposts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nd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 Wasserman, I. M. & Chua, A. L. (1980).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indicator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merican SMSA's: A Reanalysi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3), 365-381.
-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WHOQLQ: Annotated Bibliography*. Geneva: WHO.